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
本刊主编:姜锦铭

值班责编:李牧鸣 刘小草
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:(010)88051377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今世缘 特约刊登

~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~



# 即将“消失”的长江渔民

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,涪溪口周边的渔业资源开始明显萎缩,捕鱼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差

如果没有禁渔令,长江以后很快就会只剩下空荡荡的江水

今年,为保护生态环境,中国对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,最迟将在2021年1月1日全面推行暂定为期10年的禁捕政策

根据沿江各地测算,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10个省市的合法持证渔船11.3万多艘、渔民近28万人

本报记者王迪、肖林

65岁的老渔民严正华十分想念长江鱼的滋味。

长江鱼光滑、鲜嫩、肉质紧实,没有河塘鱼的“泥臭味”。

然而,他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,带着滚钩——由上百个锋利钩串联起来的传统渔具——下江捕鱼了。

去年10月,他已把所有渔具,包括渔网、鱼钩、一艘6米长的手摇小船和10米长的柴油机船等交由政府销毁,换取了16万元补偿款。根据一项全国性政策,严正华所在的长江沿岸地区将禁渔10年。

严正华来自四川宜宾市江边的新兴村,这里的人世代打鱼为生。村庄紧挨着盛产鲟鱼的涪溪口,这是金沙江汇入长江的地方。每逢夏季长江水位上涨,江水倒灌进黄沙河,都会带来数量众多的鱼群和追逐鱼群而来的数十条渔船。

在昔日挤满鱼贩子的涪溪口码头,严正华如今当起了签员,主要负责记录客渡船的进出时间和清点人数。客渡船上大部分是来自国内各地甚至海外的游客,他们从上游4公里处的李庄古镇而来。

严正华的故事,折射了中国数十万长江渔民正在经历的生活巨变。今年,为保护生态环境,中国对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,最迟将在2021年1月1日全面推行暂定为期10年的禁捕政策。

根据沿江各地测算,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10个省市的合法持证渔船11.3万多艘、渔民近28万人。

## “千斤腊子万斤象”

涪溪口是长江上游昔日丰饶渔业资源的缩影。这里盛产鲫鱼、鲤鱼、草鱼、青波、白鮰、黄辣丁、墨鮰、油鱼子等。今年初被宣布灭绝的长江白鲟和极度濒危的中华鲟,也曾是涪溪口的“常客”。

涪溪口是一个“深水沱”,水质好、江面宽,而且江面下还有40—50米深的河床。当地渔民说,涪溪口是一个大型鱼类经常出没的地方。严正华年轻时,多次在涪溪口见到“像海豚一样的大鱼”。

宜宾渔民中间流传着“千斤腊子万斤象”的说法。“腊子(鱼)”和“象(鱼)”分别指的是中华鲟和长江白鲟。白鲟是中国最大的淡水鱼类,因其吻部长,状如象鼻,俗称为“象鱼”。

千斤万斤虽属夸大,但严正华说自己曾在1993年捕过一条200多斤重、7尺长(约合2.3米)的白鲟,得两辆牛拉平板车才放得下。

“好危险哦,当时差点把我整个人拉下水去。”想起那次经历,严正华仍心有余悸。因为这次捕获,当地政府在通往涪溪口的公路上竖了一块“白鲟之乡”的广告牌。

严正华数了一下:把这条白鲟算在内,严正华在40年的捕鱼生涯里见过20多条上百斤重的大鱼,亲手捕过3条百斤以上的鱼。

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。那时候,“70斤—80斤的鱼多得很。”有一天,严正华运气好,一早上靠捕鱼就挣了七八千元。对于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他来说,捕鱼是当时能找到的最挣钱的职业,一年他可以挣十几万元。

1982年以来,中国45次白鲟观测记录中最大的一只,就是在涪溪口发现的。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等人今年3月在国际学术期刊《整体环境科学》上发表的一篇论文,这只白鲟全长3.6米,重200公斤,年龄22岁,发现于2003年。

这也是世界上最后一次关于白鲟的观测记录。危起伟等人在这篇论文里宣告了白鲟的灭绝,推测灭绝时间是在2005年以前。

危起伟告诉记者,长江是全球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。

“就水生动物而言,长江是其他河流无法比拟的,如亚马孙河鱼类种类比长江丰富,也有豚类,但是没有亚冷水性的鲟类;而美洲密西西比河,有豚类,但是没有豚类。中国长江,是唯一具有鲟类两个科(同时具有白鲟科和鲟科)的河流只有长江和密西西比河),还具有两种淡水豚类(白鱀豚和长江江豚)的,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。”危起伟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写道。

“长江淡水鱼类资源尤为丰富,特有种多,也是全球其他河流少有的。”此外,危起伟强调,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价值,远不限于渔业价值。在物种遗传资源、维持长江流域水域生态安全、净化水质和物质能量循环、提供美学、衍生、生物和环境记录等许多方面,长江具有重要的、无法估量的价值。

## 真实的渔民生活:“渔舟唱晚”还是“老人与海”?

“烟销日出不见人,欸乃一声山水绿。”

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,渔民的生活往往是闲适、诗意和孤独的,甚至透着点卓尔不群的清高。

但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《老人与海》中,捕鱼过程浸润着鲜血和汗水,充满艰险和抗争,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,渔民成了悲壮的英雄主义的化身。

真实的渔民生活,或许介于两者之间。

从1976年成为渔民起,严正华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用滚钩捕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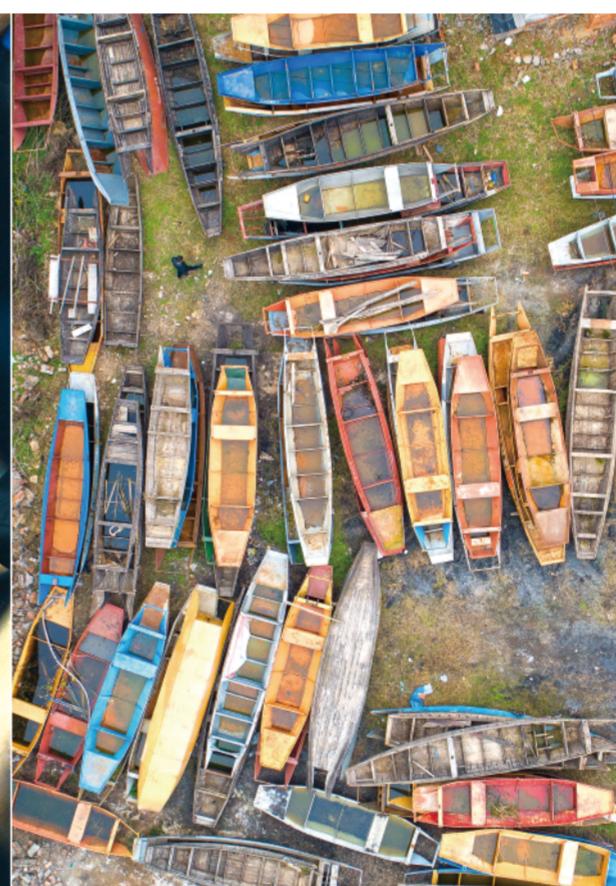
▲在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船拆解现场,一名渔民注视着渔船的拆解工作(2019年12月25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



▲2003年1月27日,在四川宜宾主城区附近的长江岸边,专家正在对一只白鲟进行救治,这只白鲟是一位渔民在涪溪口发现的。

张光金摄



▲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一处“上岸”的渔船堆放点(无人机照片),这些收回的渔船将被集中拆解(2020年1月2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

他把捡来的生锈钢丝加工成百上千只锋利的鱼钩,然后用麻绳串起,放置在贴近水底、鱼多的地方。一旦鱼儿碰到了滚钩,就会挣扎,导致更多的成排滚钩刺入身体,直到最后无法挣脱。滚钩适合捕捉两斤以上的大鱼,比如在水底觅食的鲤鱼、青鱼、鲶鱼等。

比起一张渔网动辄上千元的价格,滚钩的成本低,但风险高。“收钩的时候鱼一挣扎,绳子就会带着钩子飞起。我两根手指被扎穿过,要是弄到身上更不得了,”严正华说,“这是血盆里抓饭吃。”

1993年误捕白鲟的那次经历,他至今记忆犹新。

提起鱼钩的时候,虽然江水混浊,但严正华已感觉到这条鱼的力量和大小。还没提出水面,大鱼已挣断滚钩的主线,绳子只有一头拴住。

严正华又激动又害怕。“主要是怕伤到人,有点慌。”他不敢使蛮力,怕大鱼一尾巴打翻渔船。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把大鱼拖到家门口的河沟里。

意识到这是珍稀保护鱼类,他把大鱼拖到河沟之后,走了半个小时找到了能打电话的地方,通知了政府部门。来自水务局、公安局等多个部门的十多号人随后赶到,救治了这条白鲟,当天上午就把它放生了。

当然,并不是所有渔民的经历都像严正华那样惊心动魄。

56岁的文天国并非“天生”的渔民。他来自宜宾市高县胜天镇德利村,这个地处丘陵地带的村庄附近没有河流。文天国的父辈祖辈也没当过渔民,2007年,在一个朋友的鼓动下,他才成了一名长江渔民。直到退出捕鱼前,他每周都会到涪溪口打几次鱼。

让文天国动心的是收入。他在家种地一年只能挣到三四千元,而当渔民的头几年里通常一天挣到两三百元,也就是说一个月挣的钱超过种地的一年收成。

刚开始,他技术不熟练,到江边有点畏惧。“丢一根烟头进去,一分钟能漂20米—30米。”文天国如是形容江水的湍急。除此以外,江里还有漩涡和暗礁。早上赶去收网、取钩的时候往往天还没亮,看不清水下的情况。

但文天国渐渐克服了恐惧,并习惯了渔民的作息安排。

天的劳作从下午开始,他先去山沟沟里挖蚯蚓,穿上鱼钩。按照一米一个鱼钩的间隔,把几十上百个穿了诱饵的鱼钩串联在渔网上,然后在挨着支流河口、江水不太湍急的地方布网,这就是叫“拦河网”。第二天一早5点—6点取钩,趁着空闲时间顺便在船上撒网捕鱼,因为渔船跟着船走,这种叫“流网”。

早上8点,文天国跟餐馆老板联系,然后立刻开着柴油船送到指定的地点交货。之后,他还要清理渔网,有洞的要补上。因为常常来不及吃顿像样的早饭,他通常会在船上准备点干粮。

到了中午,在船上做饭,通常是炖个鱼汤、做个水煮鱼片或者酸菜鱼。小憩一会儿,到了下午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。

一直到2015年搬进房子前,文天国和儿子两人都挤在拥挤狭小的柴油船上过夜。照明靠蜡烛,充电靠充电宝,炒菜做饭靠蜂窝煤,吃喝拉撒都在一条船上。有时候,连手机信号都搜不到。

虽然连续很多年顿顿吃鱼,文天国还是喜欢长江鱼的味道。江里的鱼肉质紧实、鲜美,在味道上他认为宜宾所在的上游地区的鱼比下游的重庆、武汉和上海的鱼更胜一筹。因为当过兵、在建筑工地上干过,文天国去过不少地方。

“宜宾的鱼好吃,因为水流急,鱼一直在活动,所以鱼的肌肉发达,肉是很结实的。”他解释说。

## “电烧鱼”、小指宽的渔网孔径和空荡荡的江水

渔业的丰收未能持续。

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,涪溪口周边的渔业资源开始明显萎缩,捕鱼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差。

在严正华看来,这跟一些人竭泽而渔脱不了关系。

“1985年的时候,‘电烧鱼’就来了。”他说,只需要两个电瓶还有一个升压器,就能产生500伏的高压。有人把电线伸到江面下,产生的高压可以穿透几十米深的江水。只需一小会儿,伴随着“嘟嘟嘟嘟”类似电报机的声音,30—40平方米的江面上就飘满了死鱼。

“造孽得很,全部都打死了,好多都是小鱼。”严正华回忆起自己亲眼所见的电鱼场景说。

驱动电鱼行为的是暴利以及监管措施的不足。文天国说,电鱼一次可以获得50斤—60斤鱼,而在最近几年渔民一天经常只打得到2斤—3斤鱼。

“长江的江面宽,跨度大,监管存在一些问题。要是有人举报,远远听到船响,电鱼的就跑了。”文天国说。那时即使被逮住,违法者交了罚款还会换个地方重操旧业。

因为赚不到钱,鼓动文天国入行的渔民朋友没干几年就转行了。

“两三斤鱼一天也就赚个几十块钱,还不够柴油的开支。”文天国说。

夏季涨水仍然会带来收获,但渔民收获的不再是从长江倒灌进小溪流的野生鱼,而是从附近鱼塘里冲下来的鱼。文天国说,长江里的鱼看起来很光滑,鱼鳞规整,而池塘里的鱼鱼鳞粗糙,渔民一眼就看得出来区别。

鱼越少,捕鱼的手段就变得更为变本加厉。严正华说,以前当地渔网的孔径要四指宽,到2016年以后,渔网孔径只剩下小手指那么宽。

后来,严正华经常一周、半个月颗粒无收。

“打到后来有点灰心,这样下去不得了。”严正华说,如果没有禁渔令,长江以后很快就会只剩下空荡荡的江水。

栖息地丧失、水域污染和酷渔滥捕被认为是导致长江渔业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。

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认为,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在过去40年里发生了“翻天覆地的变化”。

首先,长江水系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。1980—2020年间的长江干、支流水电站建设导致长江上游成为水库群,激流环境消失,进而导致鱼群栖息地碎片化和水文环境的改变。其二,长江沿岸城市化、航运等导致河滨湖滨消落区大面积减小或被侵占,水生生物栖息地大幅度减少或消失。其三,城市生活生产污水和农业化肥农药造成了长江水污染。

“长江流域水域的上述改变,导致水生生物栖息地丧失,再加上过度捕捞和违法渔业,导致水生生物资源下降,物种濒危或灭绝。”危起伟告诉记者。

危起伟参与了农业农村部专项资金支持的2017—2020年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。调查中,长江本土鱼类中的四分之一种类在网格式调查中未被采集到,“其中包括可能灭绝的白鲟、鲥、鲸。此外的120多种鱼类,许多处于濒危状态,亟待采取抢救性保护行动。”

## 转型:有人念过往,有人向未来

在2019年年底正式退出捕鱼以前,文天国参加了几次当地组织的动员会。对于会上介绍的“无鱼可打”的事实,大家没有异议,但一些岁数大的渔民还是对退出以后的安排有顾虑。

“很多人家里十几年没种地,地都荒了。我们这种岁数,去工厂打工也是不会要的。”文天国说。

当地政府提供了电工、养殖等不同类别的免费技能培训,还举办了多场面向渔民群体的专场招聘会,也提供了一些公益性岗位。

文天国现在是一个小区的保安,他对现在的很满意。

“说心里话,现在心情也平静下来了,每个月时间一到工资就下来了。”虽然收入不如捕鱼收成最好的那几年,但文天国觉得现在收入更稳定,不那么操劳。转型后的这一年,他养了几盆花。

25岁的儿子成为电机厂里的一名工人,加班的情况下一个月能拿到5000元—6000元。

“以前他跟着我打鱼,自己没有收入,钱都是我来管。现在他自己开支,高兴得很。”文天国说。

上交渔船渔具后,文天国拿到了一次性14万元的补偿。另外,还可以在一年的过渡期里拿到每月2000块钱的补助。靠这笔补偿款作为首付,文天国买了一套80平方米、二手的电机厂职工宿舍房,就在长江边,和涪溪口隔岸相望。

宜宾市翠屏区新兴村的村民黄刚仍怀念过去江边打鱼的日子。他觉得,还是打鱼赚钱来得轻松。

“今天哪怕身上一分钱没有,打一晚上的鱼,随便都能卖两三百块。”

黄刚用补偿款在宜宾郊区开了家餐馆。也许是因为位置偏僻,生意并不十分理想。餐馆的装修十分简陋,光秃秃的墙面上贴着农村常见的国庆阅兵主题日历。

37岁的黄刚只读到小学二年级,他至今连“涪溪口”这个地名都不会写。

而严正华和文天国一样,都认为捕鱼为生的路已经走到尽头。即使禁渔政策没有出来,也早晚会有转型的那天。

“打鱼摸虾,谋不到好大的生意,也长久不了。那些反对的人,没看到趋势,那就是以后可能鱼都没得打。”

严正华的父亲和爷爷都是摆渡人。他自己大半生是渔民。他很庆幸,儿子终于离开了大江的怀抱,在遥远的广州开了几家英语培训学校。

严正华从来不准儿子打鱼,他怕儿子因为打鱼耽误了学业。“没文化的人要吃亏,不管是打什么工,干啥子都要吃亏。”严正华说。

渔民的生活转型并不容易。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2019年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,一半以上的长江渔民年龄超过了50岁,绝大部分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。他们普遍选择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最低的标准,退休时仅能领取80元—120元的养老金。

“渔民顺利转型的最大难点在于生计恢复和重建,其次是渔民搬迁上岸妥善安置,三是社会融入和社会经济整合。问题的解决需要采用组合拳,走多元化、复合型的移民安置之路。”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